

第五章

南下剿共、北上抗日



飛將軍 蔣鼎文



一、西北開發計畫未果

中原大戰以後，蔣鼎文、顧祝同、陳繼承、胡宗南、樓景樾等主力部署在洛陽、鄭州、開封、徐州一線；錢大鈞、陳誠等部駐防武漢；衛立煌部控制著津浦線南段；馮軼裴、張治中第一、第二教導師衛拱京滬。而蔣介石將收編至中央的原西北軍等部陸續調至贛閩「圍剿」紅軍，以圖一箭雙雕。

蔣介石收編的西北軍以及豫陝等的地方武裝眾多，一時之間，可供調度的達二百多萬人。憑藉如此雄厚的軍事力量，蔣既可威懾異己軍閥，亦可「進剿」正在不斷壯大的工農紅軍。這固然是蔣介石強大的一面，然大戰既已平息，如此多的兵員需要巨額的軍費支撐，而當時的國家千瘡百孔，財政左支右絀，顯然不堪重負。

蔣介石於是想到了在保持部隊編制的同時，使用大軍來開發西北的實邊策略。其時西北諸省，如陝、甘、青、寧、新疆等地貧窮困苦，經濟落後，各地稅賦收入還不足以應付地方開支。如一九二九年時，甘肅的歲入賦稅僅六十五萬元，加以漢、回、維吾爾等族雜處，種族矛盾由來已久，民風慍悍，鋌而走險者甚多，各路土匪嘯聚一方，以所占地盤大小劃分勢力範圍。在北洋政府期間，中央自顧不暇，將西北之地幾乎視為化外方域。中原大戰後，全國雖然號稱統一，然西北諸省也只是望風輸誠而已，內心依然觀望不前，各地打著自己的小算盤。

面對這種現狀，渴望真正統一的蔣介石是不會允許這種局面繼續下去的，他設想，如果在這時候利用現有軍隊開發西北，既可以減輕中央的負擔，也可贏得當地民心，對鞏固中央治理和國家的統一具有實質性作用。

中原大戰平息未幾，蔣介石把蔣鼎文和顧祝同叫到洛陽，對他們兩人說：「現在內亂平定了，國家一時又用不著這麼多的軍隊。如果裁軍復員，牽涉面廣且複雜，這個問題我想暫不去考慮。那麼這麼多軍隊怎麼辦？我想聽聽你們兩人的意見。」說完後，他盯著顧、蔣，要他們表個態。顧是非常謹慎的人，他朝蔣鼎文看看，想讓他先說。然還未待兩人回答，蔣介石首先抖出自己心中所想：「中國版圖遼闊，尤其是西北，荒涼落後是事實，但資源蘊藏豐富，需要的是加速開發。而開發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我考慮你們兩軍在不打亂編制的情況下，可以先期投入進去。」

蔣鼎文馬上說：「這樣安排很好，我們的部隊願意聽總司令的調遣。人生光陰短暫，還是要做點事情的，現在無仗可打了，使用部隊去開發西北資源，對發展經濟是大好事啊。」

顧祝同也隨之表態：「我與銘三的意見相同，願悉聽您的安排。」

蔣鼎文又詢蔣介石：「不過，西北的路程如此遙遠，地廣人稀，隴海鐵路到靈寶縣就中止了，人力、財力無法大量向西，而開發西北的事牽涉面廣且複雜，不知該怎樣著手呢？」

蔣介石對此早有考慮：「銘三，你們可以先用輕便鐵路把隴海線鋪好，穿越陝西一直到甘肅乃至青海、新



蔣鼎文夫婦（左）與顧祝同夫婦合影與臺灣

疆。舉例說，墨三先率領一個師在前面修路，你銘三帶一個師在後面接濟完善。等輕便鐵路在隴海線貫通以後，這開發西北、發展經濟的事就好辦了。」¹

蔣、顧兩人齊聲贊同蔣介石的意見。

其實，開發西北之事在兩年多以前，也即北伐結束之時就議論過。當年的七月八日，蔣介石召集一、二、三、四集團軍的首腦在北平召開戰後裁兵會議，提出北伐戰爭已經完成，全國統一了，民眾需要休養生息，因而軍隊要裁撤，裁撤下來的部隊，復員後可以去開墾、築路、治水以及採礦。

對於這樣的裁軍會議，白崇禧這一羽扇綸巾式的將領有一番慷慨激昂的發言：

我們國家幅員如此之廣，邊疆資源尚待開發。當前與其倡議裁兵，何如實施總理之兵工政策，使之實邊。如果在我國邊疆成立若干軍區，讓各部隊去從事開發工作，不但可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且可安置北伐有功的將領，使他們肩負起國家建設的重任。²

白崇禧主動請纓，他是一個回族後裔，對開發建設西北有著地利人和的方便，如果中央下決心實施這樣的宏偉計畫，他自願帶廣西子弟三五萬人前往新疆，為開發邊區作出貢獻。

其時各個集團貌合神離，開議三分鐘，各自想拳經，講講一套，做做一套。而蔣的開發建設與白的戍邊屯墾計畫還是有區別的，白是要保留桂系的軍隊編制，蔣則不然，所以白崇禧的這套計畫就無法實施。

¹ 參見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三三頁，顧祝同：《墨三九十年自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印行。

² 轉引王曉華、張慶軍編著：《中原大戰》，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〇頁。

兩年多後的今天，當蔣介石見蔣鼎文、顧祝同這樣的主力部隊將領齊聲贊同他的安排後，心中已然有譜。當他正想結束話題之時，蔣鼎文則向他請假了。

原來，一九三〇年七月中旬，中原大戰激戰正酣，諸暨老家急電蔣鼎文，說其父蔣子朗突然生病，藥吃了不少，不見有什麼起色，眼下病情反而加重，臨終之前，老父親的唯一心願是極想見蔣鼎文這個長子一面，不知能否滿足他這個最後的要求。

蔣鼎文是個孝子，憂心如焚，但當時正面作戰處於僵持且不利的一面，他猶豫再三，還是向蔣介石告假，並提出快去快回，只見老父一面的方案，也許這樣做可忠孝兩全。然蔣介石不允准他離開。至九月四日，蔣父終於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蔣鼎文聞訊慟哭，而其時所部又處於戰場最激烈之前線，蔣介石勸勉其壓住悲痛，移孝作忠，說只有待戰役獲勝後，再去補盡孝道之義。

蔣鼎文自一九二七年任第一師師長以來，僅在一九二九年初有段短暫的安定時光，在軍營舉辦了婚禮。自此後他東征西討，幾乎無日不處在風口浪尖上、槍林彈雨中。長期的征戰，使他的身體和心理極度疲乏，他需要作個調整，再加老父親停柩待安，急等長子回家料理喪事。歸心似箭，儘快回鄉是蔣鼎文此時的真實想法。

蔣介石自然滿口允諾，並讓蔣鼎文將部隊事宜交待後即可啟程。適逢何應欽有事也要去武漢，於是蔣與何合乘一架兩人可坐的小飛機，從洛陽先飛至漢口，蔣則逕自轉道奔赴浙江。

開發西北的事宜，蔣介石囑顧祝同籌畫，待蔣銘三銷假歸來後再作通盤商議。

蔣鼎文此次返回諸暨盤山，雖是為父親補辦喪事，但終歸是打勝仗歸來的一方大將，可算得上榮尊返鄉，光耀故里，唯在父親臨終之前，他未能見上一面，終使其傷感無比。對此，蔣介石有他

獨特的補救措施，蔣鼎文剛抵諸暨，他的慰問唁電也越空隨至，叮囑蔣鼎文節哀順變，移孝作忠，同時讓總部經理處撥付治喪費用三千元。¹ 這樣一來，蔣子朗葬禮規格已然提高。

待父喪料理完畢，蔣鼎文將族中輩分高的眾位鄉親請到自己的家裡，在感謝他們的幫助之後，蔣鼎文動情地說，為報答父親的養育之恩，遵循老父生前意願，他決定在村裡創辦一所學校，以利家鄉後代子女上學方便，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故爾想聽聽他們的意見，同時也請鄉親們一起來謀劃安排。

在諸暨稍事盤桓後，蔣鼎文就回到南京，他瞭解到顧祝同對開發西北之事已有具體安排。其時，顧祝同已任潼關行營主任，中央政府又任命馬鴻賓、楊虎城為甘肅省、陝西省主席。蔣介石同意他們的先期開發計畫，讓顧祝同投入九個師，其後又安排蔣鼎文帶八個師進入西北。當蔣鼎文回到洛陽時，已在春節時分，顧祝同所率的第二師，陳繼承、楊勝治的兩個師都已進駐甘肅，準備開發事宜。按照原議，很自然的，蔣鼎文也全副身心投入到如何開發西北之事去了。



蔣鼎文之父蔣子朗遺像

1 《中央日報》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第一版。

在中原大戰期間，對於楊虎城的部隊，蔣介石採取拉、編兩手。戰後，蔣在任命楊為陝西省主席的同時，又派出中央軍總參謀長朱培德在隴海線將楊部點驗，同時又命蔣鼎文去協助朱培德的工作。於是朱、蔣兩人遵蔣介石之命，完成了對楊虎城部歸入中央軍的點驗整編。

然一個更緊迫的任務中止了蔣鼎文率部開發西北的步伐，蔣介石電令他取消原先的所有計劃安排，將部隊稍作整頓後，率第九師儘快開拔到江西剿共。

二、兩個飛將軍血火碰撞

對於中央紅軍，蔣介石開始並不那麼重視，他認為派幾個師就可以剿滅，三至五個月內即可大功告竣。當時，蔣介石對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的緝拿懸賞額也僅僅五萬大洋，遠遠低於收買閻、馮將領的價碼，更不用說花費在遊說東北軍上面之費用了。他第一次圍剿時，派遣的部隊總兵力不足十萬，主要作戰部隊是以魯滌平為總指揮的第九路軍張輝瓚和譚道源兩個師，所採取的戰役方針是「分進合擊、長驅直入」，大有一舉全殲之勢。中央紅軍見其輕傲侮慢，乃將計就計，誘其深入，將張、譚兩師在興國、吉安一帶全部殲滅，戰鬥是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末至次年一月初進行的，僅十多天時間，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即告失敗。

對此，毛澤東以軍事家的口吻，瀟灑地說：蔣的「進剿軍不過十萬人，且均非蔣之嫡系，總的形勢不十分嚴重」¹。

圍剿中央紅軍的部隊這麼快就失敗，是蔣介石沒有想到的，這進一步引起了他的警惕，乃命何

1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二一七頁、二一八頁。

應欽以湘鄂贛閩四省剿匪總司令的名義，調兵增將，除原準備參加圍剿的第十九路蔡廷鍇部外，又調配了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重組了朱紹良的第六路軍，加入了韓德勤的第五十二師、香翰屏的第六十二師及五十六師、四十九師等部，共計十五個師，兵力增至二十萬人，比第一次翻了一番。何應欽將參戰各部在閩西建寧至贛江布下了一道弧形戰陣，將作戰方針調整為「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圍剿蘇區紅軍的戰役於四月一日再次開打。

對於第二次圍剿，毛澤東依然認為：「和第一次圍剿時一樣，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以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朱紹良的第八路軍為最強，其餘均較弱。」¹中央紅軍採取大迂迴的戰役方式，與國民黨的中央軍周旋，並利用地形熟悉的優勢，玩起捉迷藏戰術，然後突然奇襲。至五月下旬，紅軍又一次粉碎了蔣介石、何應欽的第二次圍剿計畫。

接二連三的失敗使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感到朱毛紅軍這個勁敵的可怕。為此，他準備拿出起家部隊，動用主力資本，對贛南紅軍作一次徹底的進剿，這就是對中央紅軍的第三次圍剿。

蔣介石對第三次圍剿可謂重視備至。

首先，他讓陳誠等重要將領深入江西，調查總結前兩次圍剿失敗的原因，並寫出總結報告，供中樞參閱；

其次，他在六月六日發出〈告全國將士書〉，表明自己將親率精銳之師，在最短時間內清除「共禍」；

其三，為歷經失敗的將領鼓勵打氣。六月七日，他致電朱紹良、孫連仲：「中定旬日後來贛督

1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二一七頁、二一八頁。

師……中來贛與諸兄共生死，自當能與諸兄同存亡。部隊調遣與增減，一聽中正之命令，必能轉危為安，請勿過慮可也。」¹

因蔣鼎文的第二軍各部散據在隴海一線，故蔣介石令其先率主力第九師迅速南來。

第三次進剿紅軍的作戰序列和調集部隊如下：

前敵總司令 何應欽		總司令 蔣中正									
右翼集團軍總司令 陳銘樞					左翼集團軍總司令 何應欽（兼）						
第三路進擊軍總指揮 上官雲相	第二軍團總指揮 孫連仲		第一軍團總指揮 蔣光鼐		第四軍團總指揮 蔣鼎文	第三軍團總指揮 朱紹良		第二路進擊軍總指揮 陳誠		第一路進擊軍總指揮 趙觀濤	
	第二十三師 李雲傑	第二十七師 高樹勳	第二十五師 孫連仲（兼）	第五十二師 韓德勤	第六十一師 戴戟（代）	第六十師 蔡廷鍔	第九師 蔣鼎文（兼）	第二十四師 許克祥	第八師 毛炳文	第五師 周渾元（代）	第十四師 陳誠（兼）
										第十一師 羅卓英	
										第六師 趙觀濤（兼）	

1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九二頁。

				第三路進擊軍總指揮 上官雲相	
				第四十七師上官雲相（兼） 第五十四師郝夢齡	
				預備軍總指揮 衛立煌	
				第十師 衛立煌（兼）	
				攻城旅 李延年	
				第十二師第三十四旅 馬琨	
				第二十三師 李雲傑等八個師一個旅	

六月二十日起，蔣介石坐鎮南昌，接連召開由各重要將領參加的軍事會議，並作出具體部署，規定這次對紅軍的作戰方針為：「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入，先求擊破紅軍主力，搗毀紅軍根據地，然後再逐漸清剿。」¹

蔣同時重點申述這次作戰將嚴格遵循黃埔建軍時制定的「連坐法」，把將帥官兵放在同一輛戰車上，大家同生共死。

這次調集的三十萬兵力中，蔣之嫡系主力軍十萬多人。分左右兩路，以鉗形方式攻擊中央紅軍，而攻擊的重點是蔣介石自己親自指揮的左翼。七月一日，蔣介石在南昌下達第三次「圍剿」攻擊命令：

一、以第二路進擊軍陳誠部之第十一師及第十四師分由南城、黎川向寧都攻擊前進。二、以第一路進擊軍趙觀濤部之第六師及預備軍第十師衛立煌部由南城、新豐向廣昌地區之頭陂攻擊

1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九三、一九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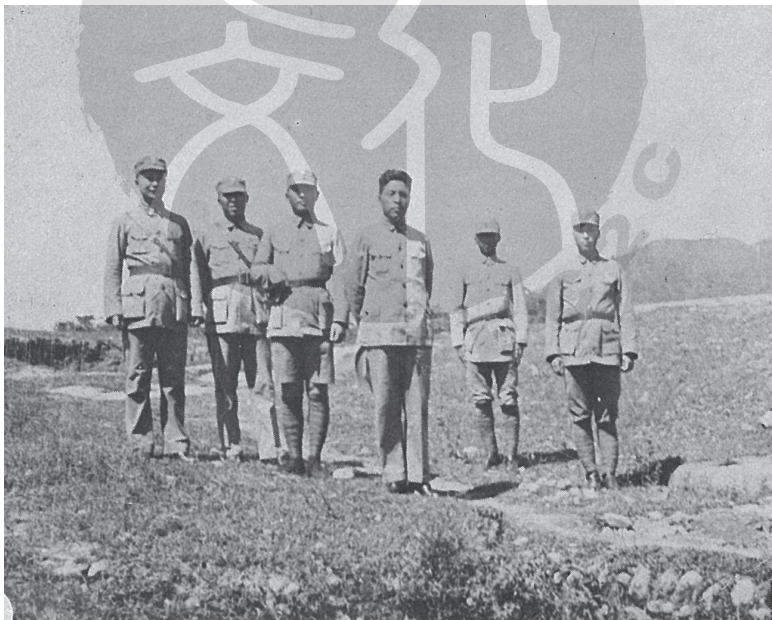
前進。三、以第三軍團朱紹良部之第八師及第二十四師分由南豐、新豐向黃陂攻擊前進。四、以第四軍團蔣鼎文部為左翼集團軍預備隊，於臨川、南城間集結相機策應第一線作戰。¹

當時左翼第四軍團實際上只有蔣鼎文第九師，其他部隊還來不及配置。其進剿紅軍的線路先期自北向南，即南城、南豐、廣昌、寧都，以向紅軍活動區域搜索式攻擊前進，沿途僅有小規模的接觸，紅軍左躲右避，不與其正面對抗。

蔣介石於七月六日在南城，七月八日在南豐，並在南豐停留至十二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康都下後即攻廣昌，廣昌下後即攻寧都、興國，贛匪不足平矣」。

七月十九日，蔣介石電令蔣鼎文等：

「第九師除留一旅守南豐外，其餘兩旅速向寧都前進，而康都、傅坊防務，即由第十師



一九三一年於江西任剿赤軍總指揮時視察陣地

¹ 蔣介石：《下第三次剿匪總攻擊令》，轉引楊奎松：《國民黨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二八三頁。

派水南或白水部隊之兩團接防。第九師派寧都部隊，務於二十二日以前到達。」¹蔣鼎文部在寧都稍作停留後，再北向瑞金區域，其後向東南於都、興國前進，所部到達興國，駐紮待命。

為應對蔣介石這次圍剿，朱毛紅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紅軍總部深感蔣介石此次行動之迅速，投入兵力之強勁，作戰方針之突出，大異以往。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如此追述：「江西粉碎敵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圍剿的戰役，都從容不迫的對付敵人。惟獨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麼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麼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結束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七月一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他們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

毛澤東又重點敘述道：「蔣介石親身出馬任總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總司令」。這次「進剿軍三十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每師九團，共約十萬人。次是蔣光鼐、蔡廷鍔、韓德勤三個師，四萬人。次是孫連仲二萬人。」他們的「進剿戰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於第二次圍剿之『步步為營』，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而消滅之。」²

由於蔣介石的中央軍初期作戰進展順利，他乃於七月二十三日公開宣稱：本軍「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據為總巢之寧都……赤匪屢經我軍跟蹤猛擊，其漏網殘餘者，本已不及萬人，其向會昌汀州狼狽逃竄時，又被沿途民團襲擊截堵，所剩更屬無幾，預計本月以內，必可全部殲滅」³。

1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九三、一九四頁。

2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二一八—二一九頁。

3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七，轉引楊奎松《國民黨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二八四頁。

紅軍方面，在第二次反圍剿後，由於時間緊迫，尚未來得及補充休整，而主力部隊在收縮之中，又陷入了國民黨大軍的重重包圍。為改變這種被動局面，中央紅軍在敵人隙縫中多次穿梭進出，在往來進出之中將主力秘密地收攏於蘇區中心，以找適當機會反攻。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寫道，我軍在興國高興圩「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師和蔣、蔡、韓軍間之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轉到蓮塘。第二天和上官雲相軍（上官指揮他自己的個師及郝夢齡師）前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師為第二仗，爾後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

正當毛澤東繼續採取「誘敵深入，尋機殲敵」，以期改變戰局被動走向之時，多情的歷史對蔣介石報以嫣然一笑。

原來，蔣介石早已為這次圍剿失敗埋下禍根。

一九三一年一月，蔣介石與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發生了「約法」之爭，至二月二十八日，蔣把胡扣留於南京湯山。胡在兩廣有深厚的基礎，他的帶職被扣引起了連鎖反應。五月上旬，手握重兵的陳濟棠聯絡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等先後發表討蔣通電。

五月二十七日，國民黨中的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和兩廣實力派聯合在廣州召開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並於次日成立「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由汪兆銘、古應芬、鄒魯、李宗仁、伍朝樞等十七人組成，蔣鼎文的恩師和軍事上的引導人蔣尊簋也是政府委員之一。

兩廣開府之時，他們又積極策動北方閻錫山、馮玉祥，特別是策動反覆無常的石友三再舉倒蔣

之旗。石友三其時依附於張學良的東北軍，野心勃勃的他，僅把依附作為棲身之所。而與石友三關係密切的韓復榘反映出的態度也捉摸不定。韓、石兩人有深厚的淵源，關係非同一般，為防韓助石，蔣介石急電中央派駐韓部代表蔣伯誠轉告：「中可保證東北絕無攻擊漢章（石）之理，請向方（韓）兄屬其安心。」¹以圖一電兩勸，表明心跡。

說變就變的石友三豈能為一紙電文所左右，他在七月十八日正式就任廣州政府所委派的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同月下旬，在河北石家莊、保定等地向張學良的東北軍武力開戰。蔣、張急調劉峙、顧祝同、于學忠、王樹常等部，沿著平漢路北上追擊石友三，至八月上旬，終將石友三部擊潰。石率殘部退到山東依附於老友韓復榘。對此情況，蔣伯誠於八月九日報告蔣介石：「石殘部到魯者實不足萬人」。

伺機而動者不僅是石友三，對於當時的困境，蔣介石在八月十六日日記中有心情複雜的記述：「閩回晉後北方尚在醞釀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鴻昌）部謀反，兩廣逆軍思逞，湖南態度不明，此五者應研究而熟慮之。」²

也就在九月四日這一天，蔣鼎文、蔡廷鍇、陳誠所部奉令移師至命令中所述之區域，準備武力阻擊粵桂軍北進的同時，南下入境討伐。蔡廷鍇對此記述道：

接南昌行營來電：「西南政府竟出兵北上，粵軍前頭隊已抵樂昌，桂軍亦抵黃沙河，著本軍

1 轉引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九七頁，二一四頁。

2 轉引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九七頁，二一四頁。

韓德勤師接防興國，其餘主力即向泰和集中……以西南興兵，使剿赤之師將前功盡棄，稍有良心的軍人與政客，莫不痛心疾首。但吾人既身廁軍籍，惟有服從命令。」¹

蔣介石南下討伐粵軍的具體部署是：以蔣鼎文擔任左路軍總指揮，以顧祝同擔任中路軍總指揮，以何鍵擔任右路總指揮。

蔣鼎文與紅軍首仗接觸正是從興國開往泰和的路途中。不期然之間，昔日同一條戰壕的戰友，今日國共兩黨的飛將軍開始以軍人的方式攻擊對方。

中原大戰後，蔣鼎文的第九師經過近半年的休整補充，人員糧彈充足，下轄三個旅十個團，計一萬五六千官兵。其中第二十五陳沛旅、第二十六劉戡旅為第九師主力，陳琪的獨立旅系收編唐生智部後整編而成，故又稱「補充旅」，戰力稍遜。第九師雖走南闖北，久歷戰陣，但與紅軍開仗還是第一次。

第九師自六月進入江西，與紅軍主力並無大規模的接戰。為對付這次圍剿，朱毛紅軍採取的是「堅壁清野，大步退卻，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毛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我們「只有等到敵人深入根據地，吃盡根據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江西反對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於根據地後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1 《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二五一頁。

毛澤東所講的上述狀況，在蔣鼎文和蔡廷鍇的記述中也得到了印證。蔡廷鍇說：「我軍不停追剿，日夜奔馳，官兵極度勞苦，且食鹽不濟，各官兵都面帶土色。」蔣鼎文說：

這一年贛南天氣亢熱，士官兵長途行軍，對贛南水土不服，加以進入匪區之後，共匪實行堅壁清野政策，把糧食運走藏匿或焚毀，把壯丁帶走，老弱婦孺留下，我們進入匪區後幾乎完全仰賴後方補給，有時補給中斷，士兵們便營養不良。匪區中由於經過長年封鎖，食鹽最感缺乏，這是我們行軍中一項大困擾。另外醫藥衛生器材缺乏，瘧疾猖獗，光是我第九師的病患就有三千多人，隨軍的醫護人員根本沒有辦法來醫護這樣多的病患。匪區中一切情況不明，自不能留下病患。所以，在行軍途中構成一項嚴重負擔。那時我們的空軍有限，陳嘉尚雖然用小型飛機來接濟我們奎寧丸一類的醫品，但是為數太少，實在無濟於事。

紅軍是在遊擊戰中成長壯大的，當碰到蔣軍挾如此強盛之勢時，決不正面與之接戰，而是避其鋒芒，讓其優勢兵力無用武之地，然後以大踏步的迂迴，牽著彼方鼻子轉，把所有追剿之師拖得筋疲力盡，致使蔣軍非戰鬥減員大大增加，且士兵的身心處於極度緊張之中。

蔣鼎文繼續敘述道：

由於種種原因，行軍宿營途中時常發生嘯營。嘯營是一種非常可怕之事，由於緊張和疲勞而產生，睡眠中全營驚叫，是一種集體的歇斯底里症，我就曾親眼看見我的士兵在夜間嘯營。有

一夜行軍之後，我睡在樓上，半夜沒有入睡，看見一隻小貓從熟睡的士兵身旁經過，這個士兵朦朧恍惚中一聲驚叫，全屋士兵皆在睡中隨之驚叫，怕人的很，我在樓上用拐杖狂擊地板才寂靜下來。¹

蔣鼎文與蔡廷鍔兩人早年在廣東之時已彼此相熟；中原之戰中，兩人又碰過面，商討過戰法。但自第九師入贛剿共以後，兩人還未曾謀面。當接到南下討粵電令後，蔣鼎文極欲與蔡廷鍔相約會師，他一方面要瞭解一些原與蔡同處於陳銘樞手下的陳濟棠粵軍的情況；一方面也要瞭解蘇區紅軍的情況，因為蔡已經參加過對紅軍的兩次圍剿，連同這次，蔡已是第三次對紅軍作戰，所積累的戰鬥經驗實可供借鑒。因而蔣鼎文認為「有很多事要與他當面解決」。

蔣、蔡二人通電相約，在興國西北的高興墟見面；蔣部從興國縣東北方向行進，蔡部從興國之北的崇賢、方太之間南進。當蔣鼎文按指定時間到達高興墟後，蔡部卻不知何故還未趕到。因粵方軍情緊急，蔣鼎文不能久等，只有率軍先往泰和方向集結。

興國至泰和間，山勢險峻，林深茂密，羊腸小徑，山路迂迴，輜重運輸殊為困難，大部隊行軍見首不見尾，聯絡亦十分不易。尤以黃土坳到老營盤的二十多里路為險，盤曲綿延，兩山夾峙中的深谷僅有一小徑可通，若有部隊在山上設伏，居高臨下俯擊，則行軍的隊伍有覆沒之可能。當年曾國藩的湘軍就在這裡吃了太平軍設伏襲擊的大虧。因而身履如此險境，蔣鼎文不是沒有準備，他派出偵探打聽，回來報告後都說，沒有發現紅軍大部隊集結的現象。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三五頁。

使蔣、蔡想不到的是，朱、毛、彭、黃紅軍不但偵知了蔣、蔡之部的行軍線路、部隊番號、會合時間，而且還瞭解到部隊調至泰和集中的真正用意是去阻截粵軍北上攻擊。

見戰機來到，朱毛下令：

由黃公略指揮紅三軍及肖克獨立五師在老營盤與黃土坳一線襲擊蔣鼎文第九師；由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及紅四軍一部在高興墟將蔣、蔡二部截開，不使其聯接，分頭殲擊。

鑒於獨立旅戰鬥力相對較弱，蔣鼎文讓獨立旅旅長陳琪掩護三千多傷病號先行，自己率領主力斷後，以防止紅軍尾追。九月六日，陳琪的獨立旅到達老營盤、黃土坳一線的高明山、牛軛嶺、野豬窩之三角地帶。

黃公略看到敵軍已大部進入設伏範圍，乃下令發起猛烈攻擊。陳琪部的四個營剛好通過一座獨木橋，其時因雨勢猛烈，導致山洪暴發，獨木橋不堪兵馬重負，突然之間被沖斷。陳琪無奈，親率其餘五個營繞道行進。黃公略見天賜良機，乃急衝而下，乘勢將該旅圍成數截，同時以一部佔據高地對獨立旅點射攻擊。

蔣鼎文頓感事出意料，急命劉戡的第二十六旅會合增援，然紅軍早有準備，又從山上衝下一支隊伍，死命將其兩旅用火力隔離，絕不使兩部會合。對此，蔣鼎文是如此記述當時情形的：

我也曾派斥候探聽匪情，都回報說並沒有大量結集匪軍的跡象，這時哪裡來這樣多的匪軍，我拿望遠鏡兩邊估計一下，足有三個師以上的兵力，敵人的力量足足的三倍於我。友軍在山外自然沒有辦法打進山區來支援我，同時事急勢迫，根本來不及支援，兩邊的山上樹上都張貼了

「活捉蔣介石走狗蔣鼎文」、「消滅第九師」和許多勸降的標語。這時我們已被圍在絕地裡了，在狹窄的小路上擠滿了騾馬輜重，想動一下都沒有辦法。我想到兵法上說的「置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我把心一橫，下令就地作戰，自尋掩避，不准離開自己所在地一步，命令二十六旅增援、二十五旅擔任後衛。山上的匪蜂擁而下，殺聲震天，高級幕僚及旅長之流，都因為處於絕境和優勢的敵方兵力而寒了膽，有一個團長向我報告說：「總指揮！我們衝出去吧！」我堅決地命令說：「絕對就地應戰，不能突圍。」這樣的惡劣地形，敵人居高臨下，我只要稍一動搖下令突圍，陣勢必亂，正好成了居於高地的敵人活靶，我這一師的士兵階層非常健全，訓練好、聽指揮，對我有很大信心，聽說我下令就地堅守，每人都能目不見掩蔽，沉著應戰，打死不退。這樣的惡戰一直打到第二天，匪軍看著沒有辦法消滅我們，才向四面八方退去。匪軍的爬山本領好、地形熟、能吃苦、長於急行軍，所以易於集結，也易於疏散。等到國軍整頓好再進擊時，很難捕捉到匪軍主力。¹

這一仗，陳琪的獨立旅傷亡慘重，第一團團長劉銘被紅軍俘獲，第二團團長鄭述禮被紅軍擊殺。紅軍的戰報是該旅被殲滅，擊殺俘獲二千多人，繳獲槍支二千多；而國民黨軍的報導說是「第九師沉著應戰，斃匪三四千，將匪擊退，擄獲槍械檔多種」。雙方說法不一，是黃公略獲勝，還是蔣鼎文報捷？

綜合檔案史料分析，這一仗第九師獨立旅實是被擊潰。在九月六日蔣部遭襲時，蔣鼎文即向蔣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三七—三八頁。

介石電告兩軍正在激戰之中；至後，蔣鼎文又報告：獨立旅「主力激戰至晚損失十之八九，廿六旅之兩團與赤匪反覆衝擊肉搏七八次者，死傷亦多，赤匪之死傷尤倍於我方，骸骨狼藉遍山皆是」；九月八日，蔣介石特電報詢問蔣鼎文此次遭襲的損失，未見問其戰果如何。¹

蔣鼎文這位國軍「飛將軍」沒有想到的是，這場奇襲作戰的戰場最高指揮官，正是被毛澤東譽為紅軍「飛將軍」的黃公略。五年之前，黃公略與蔣鼎文所部同生共死，不畏猛烈的炮火，協力攻佔武昌城。五年之後，這兩位飛將軍刀槍相向，直欲置對方絕地而後快。

黃公略，原名漢魂，湖南湘鄉人。一八九八年一月出生，湖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後，在湘軍任連長。北伐時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一師，因黃作戰勇敢，被提升為少校團附。一九二七年一月，黃進入黃埔軍校第三期高級班學習。後參加廣州起義，加入共產黨，其後又應彭德懷之邀到湖南獨立五師任營長一職，旋與彭德懷一起成立工農紅軍第五軍，並到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後出任紅三軍軍長。因黃在作戰中顯露出色的軍事才華，屢獲勝仗，在蘇區中享有崇高威望，時與朱德、毛澤東、彭德懷並稱為「朱、毛、彭、黃」。其所率紅三軍，與林彪紅四軍、彭德懷紅五軍，並稱為紅軍三大主力。黃公略在第一、第二次反圍剿作戰中，均以主力部隊的身分參與了重要的戰役。

毛澤東曾三次將黃公略寫入其詩句，這在將星如雲的共產黨將領中絕無僅有。

而蔡廷鍇之所以無法及時趕到高興墟與第九師會合，實是被紅軍強力阻截。當蔡六十師和六十一師靠近高興墟時，蔣鼎文的第九師已到了老營盤一線，兩軍始終無法會合。

¹ 以上均見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蔡廷鍇是這樣回憶高興墟一戰的：

晨即令張炎率六十一師向高興東北地區前進，我則率第六十師正向高興墟，以鄧志才旅為前衛搜索前進……接鄧旅長報告：「今晨第九師已由此間向老營盤。現高興以北地區發現大部赤敵，刻向我前進，準備迎擊。」我令張師（六十一師）設法向高興靠近。惟當時高興已被敵人包圍，交通線均被截斷，傳令兵無法達到任務，而敵人已蜂擁而來，愈接愈近，只得即令衛士隊散開，向敵迎擊。不久，沈師部及劉占雄旅趕到，即令其向當面之敵猛攻，敵勢始稍殺。黃昏時，敵復來攻，戰鬥激烈，時我之無線電站已與各站聯絡，六十一師張代師長來電報告，謂：「第九師今午在老營盤附近為赤敵邀擊，先頭旅損失約兩團，刻已與該師取得聯絡。惟赤敵主力現已向南（高興墟）移動，職部在激戰中。」我接電後，知欲六十一師之來增援已屬無望，只得率沈部（缺鄧旅）及區師之雲團、謝瓊生之補充團共四團，集結於墟內外與敵決戰。入夜，赤敵不斷向我作猛烈衝擊，雙方均用刺刀肉搏不下數十次，殺至天明，戰事更為激烈……激戰至午後三時，敵以其最強悍之部隊及彭德懷之軍官隊向我猛衝。我軍突受此強力壓逼，全線略為動搖，六十師沈師長及師部不明前線情況，又不沉著，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竟受潰兵之影響，擅自向興國方面退去十餘里，甚至總部人員及我之隨從亦有逃跑，頗為紊亂，無線電亦放出緊急電。當時我見此情景，危殆萬分，憤欲自殺以殉，惟念橫豎一死，未到敵將我俘虜之時，先死殊不值，即決心與敵再拼一個你死我活……七時許，敵方火力已薄弱，我料敵屢衝不逞，必退卻無疑，即令劉旅長占雄派團長劉漢忠，集結兵力兩營，向敵出擊。九時，距墟二十米達已

無敵蹤，槍聲亦不聞，我出擊隊追出約一里許地方嚴密警戒，一場惡戰方告停息。是時不沉著的沈師長及各官兵，亦已陸續歸來。我即令沈師鄧旅向高興墟靠攏，六十一師向鄧旅接近，切實聯絡，並囑其將高興墟情形通告蔣師長鼎文。¹

當蔣、蔡兩部終於會合時，蔣鼎文說：「我的兩眼充血」，而蔡廷鍇則說：「經此惡戰，我三天內不曾闔眼。」

蔣、蔡合議，欲再找紅軍作戰，而其時紅軍的主力已迅速撤出，不知去向了，蔣、蔡只能徒喚奈何。

此仗亦是天賜良機，因天降大雨，蔣、蔡兩部在高興墟會合未成，兵力分散，致使紅軍尋找到分襲其兩軍的戰機。實際上，蔣率兵在白天離開之時，蔡部即在晚間抵達高興墟週邊。然為時已晚，黃公略部這邊，將第九師設伏襲擊，而紅三軍團這邊，則將第十九路軍圍住阻擊。按照國民黨軍的說法，此戰「若非第九師將士用命，遇此強敵，斷難支持。當九師苦戰之際，亦正蔡軍危急之時，假如九師後方之高興墟無十九路軍之到達，則九師必受重大損害，倘九師不幸而失利，則十九路軍亦難倖存也」²。

自此後，蔣、蔡兩人成了生死患難之交，此後他們有過並肩赴滬抗擊日軍的合作，同時又有福建干戈相向的殊死搏鬥。對這，下文再述。

¹ 《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二五一—二五三頁。

²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一一頁。

其後，南昌行營電告蔡廷鍇，將原由第十九路軍指揮的韓德勤第五十二師直接歸入蔣鼎文指揮，第五十二師隨第九師改道富田向吉安前進。

蔣軍的這一調動又被中央紅軍偵知，紅軍有針對性地作出部署。

蔣鼎文知道，韓德勤的五十二師雖然參加了第二次「圍剿」，然其戰鬥力薄弱，不足以擔當對紅軍的正面作戰，尤在眼下之際，中央紅軍已集中主力，隨時可尋求機會殲擊一部，剛剛發生的老營盤、黃土坳、高興墟之戰就是明證。於是，蔣鼎文有針對性地作出安排，令韓德勤的五十二師跟隨第九師之後，掩護輜重和傷患行進。殊不知，紅軍也隨之應變。

至九月十三日，蔣的第九師、韓的第五十二師間隔一定距離，向方石嶺行進，傍晚，兩軍抵達方石嶺宿營。

十四日，蔣率第九師先行通過方石嶺，紅軍並未開打，而至下午三時蔣鼎文到達九村嶺時，設伏的紅軍迅速用一部兵力，強行將第九師和第五十二師分開兩截，並用重兵拼死堵住方石嶺隘口，一方面阻擊第九師返回援救，一方面以大部兵力圍殲韓之五十二師。

打此次伏擊的戰場指揮官依然是紅軍擅戰之師黃公略為主的第三軍和羅炳輝的第十二軍。

蔣鼎文接到韓德勤急報，知事起突然，有些出乎意料，乃一邊急電蔣介石請求速派飛機支援，一邊急令陳沛之主力旅迅速回救。儘管陳旅火力強勁，攻勢兇猛，終被紅軍頑強阻擋，幾次反覆衝鋒，始終無法與韓師會合。紅軍見敵來援強勁，乃再度集中火力將韓德勤師擊潰，韓師之旅長張宗黻、團長甘達朝被擊斃，韓德勤失蹤，後化裝成伙夫得以逃回。黃公略見殲敵一部目的已經達到，即令所部迅速撤出戰場。蔣鼎文急令所部趁勢追擊黃公略軍。

這時候，蔣鼎文請求調派的飛機趕到作火力增援，並無所顧忌地低空盤旋搜索，見紅軍成隊撤離，便用機關槍不間斷地俯射。黃公略不顧安危地站立起身，大聲指揮部隊就地隱蔽避彈，突然被一陣猛烈的機關槍彈擊中腹部，貫穿內臟，經搶救無效而身亡，血灑疆場，年僅三十三歲。

中央紅軍取勝的關鍵當然是戰略戰術的得當，而如此精準的奇襲打擊，則是靠情報的準確偵知和掌握。令蔣鼎文、陳琪他們沒有想到的，偵悉他們軍旅行蹤的卻是他們的小同鄉，由馮文彬所領導的紅軍無線電大隊。

還是在本年之初，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時全殲了張輝瓚的十八師，同時俘虜了該師無線電臺台長王諍等十多人。經過朱德、毛澤東的啟發勸導，王諍等人加入了紅軍；其後，黃公略在第二次反圍剿作戰中，在殲滅公秉藩師時又繳獲該師的電臺和一部一百瓦大功率的發報機。紅一方面軍總部乃於同年五月建立無線電大隊，由馮文彬出任政委，王諍出任隊長，至六月，又正式建立無線電偵察隊。

馮文彬，浙江諸暨涇池鎮湖西村人，一九一一年出生於一貧苦家庭。參加過五卅運動，後當選為上海工會聯合會常委，一九二九年在閩西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四軍、紅一軍、交通大隊政治委員等職，尤以善做政治工作著稱。馮文彬在領導無線電大隊時，充分發揮王諍等技術人員的特長。王諍他們對國民黨軍的電臺呼號非常熟悉，他們還知道，國民黨軍輕視紅軍人員的知識構成，對無線電臺的管理鬆懈，為圖方便，電臺之間的聯繫乃至部隊調度他們常常用明碼通話。這樣大大咧咧，疏於保密，就極大地方便了紅軍的偵聽，故而國民黨的不少軍事情報，其接受對象尚未來得及消化實施，紅軍總部就已經知道其動向，從而可以從容地部署奇襲伏擊、阻擊後撤出等等。紅軍

總司令朱德對偵聽工作非常重視，幾乎每日過問，給電臺技術人員的待遇優厚有加，當時無線電臺台長王諍的工資是每月四十塊大洋，而其時總司令朱德的待遇則為每月五塊大洋。¹

自此後，馮文彬與王諍結成終身知交，直到新中國建立後兩人同任高職。馮文彬的家鄉與蔣鼎文的盤山村相距約四十里，與陳琪的店口村僅相隔十餘里而已。

直至事後，蔣鼎文他們才明白紅軍如此精準設伏的原因：

在這一次剿匪行動中，我率領的這一部分正行軍到興國，陳濟棠（伯南）在廣東背叛中央，中央預定三路南下討伐陳濟棠，我擔任左路，顧祝同擔任中路，何鍵擔任右路。我與我的部隊連絡和與蔡廷鍇的十九路軍連絡統用無線電通信，這些通信被匪偵破，所以我與蔡廷鍇的行動便暴露了。²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研究後認為，毛澤東和他的紅軍總部，「凡國民黨軍隊隊長姓名，所屬私人關係之系統，是否屬於蔣之嫡系，士氣如何，由何路前進，他都有預報。」³

蔡廷鍇的十九路軍是一支能征善戰之師，但綜合戰力比之於蔣介石嫡系主力第九師還是稍遜一籌。前已引述，毛澤東將第三次國民黨圍剿軍的軍力分成四個等級：第一等為蔣鼎文等五個主力師，

1 郝在今：《中國秘密戰》，金城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四頁。

2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三六頁。

3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〇七頁。

第二等為蔡廷鍇等三個師，第三等為孫連仲軍，其餘部隊為第四等。而第二次反圍剿之時，毛澤東把蔡部則列為第一等軍力。那麼，為什麼蔣鼎文損兵折將而蔡廷鍇可以與紅軍打成對峙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蔣鼎文因出任南下討伐軍左路總指揮，他的注意力已集中於如何對付粵桂軍，而對紅軍有所放鬆。

第二，蔣鼎文第九師在興國向泰和前進時，與蔡廷鍇會師未果，後孤軍沿山林小徑突進。紅軍則借助有利地形奇襲，特別是集中優勢兵力，對進蔣部相對薄弱處突然出擊，先在九月上旬老營盤擊其獨立旅，次在一星期後，又殲其隨同進擊的韓德勤第五十二師。但是這兩仗蔣鼎文的主力兩個旅損失不大。

第三，蔣鼎文的獨立旅系從唐生智部改編未久之兵員，多係北方人士，戰力一般，適遇夏天，傷病等非戰鬥性減員十分嚴重，遇到紅軍潮水一般的突然攻襲，潰敗亦然。

對於蔡廷鍇部，紅軍當時的部署是攔截其與蔣鼎文部會合，並未把他當作殲滅對象。從地形上來說，高興墟一帶相對平坦，不利設伏。紅軍其時的部隊或無足夠的優勢兵力集中，打到後來，設伏的紅軍指揮員一時興起，亦想殲滅蔡軍，未果。其後紅軍在總結這次作戰時多次提到，打蔡廷鍇之仗，沒有集中優勢兵力，這是其一。

其二，蔡廷鍇軍本是一支能打硬仗之部，即或紅軍幾乎突入軍指揮部也不退縮，蔡本人依然作殊死抵抗。

第三，蔣介石其時出於對付粵軍的需要，百般籠絡陳銘樞、蔡廷鍇部隊，對十九路軍槍械彈藥、

經費撥付特別充足，從而使蔡部的戰鬥力更上一層。

戰場上的你死我活就是專揀對方薄弱處打擊，從不以主客觀原因論勝負。紅軍對韓德勤部乃至蔣、蔡兩部均予以重創，使一時的被動形勢暫時轉為主動。

紅軍當然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重要將領紅三軍軍長黃公略、紅三軍團第四師師長鄒平、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曾士莪等英勇犧牲，特別是黃公略之死，使朱、毛、彭倍感痛心。黃公略犧牲三天後即舉行了追悼大會，毛澤東滿腔悲憤，親筆撰寫了挽聯：「廣州暴動不死，平江暴動不死，而今竟犧牲，堪恨大禍從天落；革命戰爭有功，遊擊戰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教後世繼君來。」

對於此時的戰場態勢，民國史專家楊奎松是如此評述的：「整個第三次圍剿，與前兩次相比，國民黨方面基本上控制著戰場局面……而紅軍在國民黨大軍『圍追堵截』之下，卻顯得極為被動，甚至接連受到挫折。」¹

繼廣州政府進逼蔣介石中央軍日甚一日之後，復有九一八事變發生，民族矛盾頓時激化，蔣介石乃停止進攻。聲勢浩大的第三次圍剿就這樣匆匆收場了。

三、贛東圍剿方志敏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寧粵雙方均暫停了軍事行動，然中央軍圍剿紅軍的主力部隊並沒有調離江西前線。蔡廷鍇、蔣鼎文兩軍在興國相會後，蔡奉令放棄興國，南下贛州駐防；蔣鼎文則奉命由富

1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八六頁。

田直接轉向吉安整訓待命。

蔣鼎文所沒有想到的是，正當他此前全副身心投入圍剿紅軍之時，蔣介石因政治之需，一度打算讓他回故鄉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並把其所率軍隊也同時調入浙江。

事情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感到「粵變」之事盤根錯節，處理之難出乎想像。他沒有預料到，扣留胡漢民會導致國民黨內反蔣派系空前的大聯合，且這次聯合反蔣是在革命發源地的廣東引發，以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四個中央監察委員以「彈劾」通電的合法形式首先提出。這樣，蔣介石不能施以武力鎮壓，而只能用和平談判的手段去解決，俾使寧粵對峙平息。蔣介石還有一種打算，如在和平談判中粵方能提出完整的接收政府計畫，他的進退也是可以考慮的。以退為進是蔣介石從跟隨孫中山後一直操弄的政治策略，憑他爐火純青的手法屢試不爽，且每退一次，後勁加足，復出後，權力更進一步。他唯一不肯放手的是對軍隊和重要將領的控制，他離職之前總是對重要將領作出妥善的安排。這次「粵變」危機日趨嚴峻，蔣介石也是這樣考慮的：

如為革命計，有辭職之必要，則當立辭……對各軍則略與安置，勿使失所。顧（祝同）長蘇，蔣（鼎文）長浙，朱（培德）長閩，熊（式輝）長贛，魯（滌平）長滬。四軍團移浙，二軍團移蘇，一軍團移汕，三軍團移閩；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二十三、第五十三、第二十六、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二十八各師暫駐江西。¹

1 《蔣介石日記》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轉引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二四三—二四四頁。

對於粵方的發難，寧方內部或戰或和也莫衷一是。蔣介石面對難測風雲，又一時難決。然當粵方舉起武力大旗之時，蔣的和平動議便戛然中止。適逢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下野後的人事安排計畫也隨之取消。

回來再敘，自蔣鼎文的第九師駐防吉安以後，對所部進行整訓改編。鑒於獨立旅被中央紅軍擊潰，乃取消旅的編制，縮編成獨立團，由張瓊出任團長。另外，旅團長也有升有降，原二十六旅旅長劉戡被調至第十師任師長，該旅旅長由五十四團團長鄭作民升任；五十三團副團長吳斌調升為五十四團團長；免去劉鑄軍四十九團團長一職，所缺由劉國鈞遞升；陳沛仍任二十五旅旅長一職，李楚瀛、謝輔三、李向榮、周開勳等依然為第五十團、五十一團、五十二團、五十三團團長之職。

蔣介石在與粵方周旋和談、商討共禦日軍的同時，對中央紅軍的圍剿還是沒有完全放棄，他一方面調派部隊增援京滬，一方面對留贛之中央軍又作出圍剿部署。

十月上旬，蔣介石命蔡廷鍇部離贛調至京滬。

同月，蔣介石命蔣鼎文率部從吉安開赴江西東北部。蔣鼎文此次指揮的部隊有第九師、第七十九師、第五十五師，第五十三師之一百六十七旅，第四師之第十旅、獨立三旅，各部均向上饒地區集中，由此開始了長達四個月的贛東北圍剿戰役。這次軍事行動實是第三次圍剿的延伸，可謂征戰餘波，動盪不息。

蔣鼎文此次圍剿的是方志敏、邵式平、劉疇西等率領的紅色武裝。方志敏、邵式平等領導的紅軍在贛東地區從事武裝鬥爭多年，再加領導人係當地人士，群眾基礎好，魚水相融，根據地的發展如火如荼，蔚然有色。

其時，贛東北的紅軍主要有紅十軍、贛東縱隊、人民自衛軍等，約有五萬人左右。當時佔領的地方主要是河口以西、餘干以東、資溪以北、樂平以南地區，且日益擴大，逐漸有與贛南蘇區中央主力紅軍連成一片的態勢。這種發展速度是蔣介石所不願意看到的，於是他令蔣鼎文部對贛東紅軍根據地採用梳篦式進剿，這種搜索式攻擊，實也是蔣鼎文在圍剿時總結出來的。

原先，國民黨中央軍力圖在短時間內剿滅紅軍，因而所到之處是「蜻蜓點水」，大軍路過一地，即算攻占，而紅軍正是利用蔣軍這一「浮誇」，回馬一槍，復又再來，重新取得革命根據地，使國民黨軍的成果「得而復失」。

鑒此，蔣鼎文總結剿共得失，採用軍事和政治並舉的剿共手法。他令上饒區行政督察專員王澤民組織一批政工人員，跟隨其部隊出發，他率軍在前面武裝進剿，安營紮寨，修碉築堡，王澤民的政工人員隨之接收，鞏固地方政權，並以三民主義宣導安撫當地民眾。蔣鼎文挾武力之優勢，將所部分成左中右三個縱隊，由東向西，作全方位的搜索式攻擊。

恰恰在此時，贛東北的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平等與中共中央派來主持工作的曾洪易、萬永誠等領導，在對付蔣軍清剿戰略上發生了嚴重分歧。方、邵、周主張向皖、浙邊界發展，認為那裡的蔣軍佈防薄弱，且多山嶺，迴旋餘地大，可以不打或少打堡壘戰，用遊擊戰術來拖垮並尋機打擊蔣軍；在皖浙贛邊區取得根據地以後，再經過仙霞嶺打通閩北，進而與中央蘇區連成一片。而曾、萬則認為，中央蘇區在西南，就必須向西南發展，只有粉碎敵人的堡壘政策，才能消滅敵人；只有與蔣軍作硬碰硬的對抗，才能消滅敵軍有生力量，才能與中央蘇區連成一片。並指責方、邵在敵堡壘政策面前膽小退卻，就是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曾、萬是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代表，方、邵、周部不得不聽從中央的意見。

最後，贛東北的紅軍武裝按照曾、萬的指導方針迎接蔣鼎文部的圍剿，蔣軍圍寨築堡到哪裡，紅軍就到哪裡去開打，幾乎是針鋒相對。「紅十軍的幹部戰士表現出無比的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他們在敵人的堡壘前血流遍地。光是攻打貴溪夏家嶺的一個堡壘，就連續組織了四次進攻，傷亡一千八百人……貴溪縣委書記花春山，八十三團團長龍志光也犧牲在這裡。紅十軍遭到前所未有的災難性損失」¹。

蔣鼎文部在十月下旬已將追剿紅軍的部隊推進到萬年、餘江、金溪一線，並且占領了橫峰、弋陽、貴溪、餘江各縣及迤南地區。至十一月上旬，第九師第四十九團劉鈞部進駐餘幹，第五十三團周開勳部進駐珠山橋，第五十四團吳斌部進駐大橋。在這當中，方志敏的紅十軍所部與第九師二十五旅在餘江、珠山橋分別打了幾場規模不小的戰鬥，雙方都有數百人傷亡，唯蔣軍因碉堡戰術，工事堅固，兵力優勢，紅軍戰法未能實際奏效。

對於這次贛東北的清剿戰果，國民黨方面是這樣記述的：「贛東清剿，歷時四個月（一九三一年十月—一九三二年一月），破其巢穴，斷其糧食，軍政配合，地方秩序逐漸恢復，匪勢實力蹙，無法立足。厥後匪首方志敏、劉疇西，卒被我友軍擒獲，贛東之匪於是肅清」²。

上述戰果或有些誇大，但確也有些實情，共產黨方面的史書也認為，「在曾洪易『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下，贛東北蘇區未能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也未能打通與中央根據地的聯繫。」「曾

1 石凌鶴等：《方志敏傳》，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一四〇—一四一頁

2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一三頁。

洪易自稱「百分之百正確」的戰略，在敵人堡壘面前碰壁」¹。此時的蔣鼎文所部「進犯贛東北方志敏的紅十軍頻頻得手」²。「紅十軍歷經半年多的苦戰，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根據地大部分被敵人占領」³。

蔣鼎文這種扎實的進剿方式使他聲譽鵲起，在國民黨內贏得了「高級將領深入匪區者第一人」之稱謂⁴。蔣鼎文對剿共經驗有總結、有建言，他抨擊陳誠剿共策略失誤，並向蔣介石請纓，讓他率三個精銳師，按照他所採用的戰術，足可蕩平共匪。

蔣鼎文是如此總結的：

我們進入赤區，老百姓不敢和我們多講話，並不是老百姓不歡迎我們……國軍是流動的，不能永遠駐下來保護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來和國軍合作……至於說到共匪軍事上的戰略戰術，不外是「短打突擊」，在整個戰局上應是居於劣勢，但是在部分戰役中他們會爭取勝利，他們仰仗地形熟、情報靈活、訓練士兵能急行軍、能耐疲勞，在最短期內迅速集結優於國軍某一部分幾倍以上的兵力，很快地解決國軍的小部隊然後脫離戰場，四散奔逃，使國軍找不到還手的主力。這多次的小勝利挽救整個局面的劣勢，他們利用這種戰術使國軍吃虧不

1 石凌鶴等：《方志敏傳》，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一四〇—一四一頁。

2 轉引金一南：《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〇〇頁。

3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三二五頁。

4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一三頁。

少。我針對共匪戰術，訓練部隊要能堅守到底，就地作戰決不撤退，苦守待援。在廬山訓練時，委員長找我去談話，我把我剿匪的意見報告了委員長並且說：「有裝備好訓練好的三個師兵力，採用我的戰術，是足以剿平共匪的。」民國二十三年（二十二）二、三月間，陳辭修率領六十一（五十一）、六十二（五十二）、六十三（五十九）三個師在江西進剿，沒有多久便全部斷送了，就是因為他不懂匪軍戰術之故。¹

在這裡，蔣鼎文之所以抨擊「陳誠不懂匪軍戰術之故」而導致失敗，很大程度上是他一手創立、賴以成名的李延年第九師也在陳誠的一度指揮下遭受重創。也或之故，蔣鼎文把痛惜之情發洩到陳誠身上。

蔣鼎文所提出的「步步為營，步步推進」的剿共戰略，深得蔣介石的贊許和推廣。其後就全面推廣，實際運用到對付中央紅軍的圍剿上來。

然軍事是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戰術又僅是軍事的一個細胞，縱使局部戰術對路，可要以此剿平共匪，也只不過是軍人的線性思維，否則星星之火怎可燎原？

四、北上抗日

寧粵之爭愈演愈烈，國內各派對他們面對如此民族災難依然紛爭不息、干戈不停，非議聲浪日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〇頁。其中時間、師的番號或有誤，參見第十二章第二節。

盛一日。胡漢民等人認為，寧粵合作的前提是蔣介石必須下野。我們「不能否認，蔣介石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¹。於是，蔣介石決定滿足粵方的要求，放棄內爭，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發出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職務的通電，十二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批准蔣介石的辭職要求。

在這期間，蔣鼎文與劉峙、顧祝同、胡宗南等黃埔系軍人紛紛通電，向蔣介石表示效忠。這對蔣介石來說，既是內心安慰，更重要的是向其他各派表明，他雖係下野之身，但重要軍事將領依然聽從於他，他依然軍權在握。

日本侵略軍終於向中國的重要城市動手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滬戰事爆發。

駐防京滬之地的蔣光鼐、蔡廷鍔十九路軍對日軍的武力挑釁猛然還擊，蔡廷鍔令七十八師區壽年部展開應戰。鑒於外敵囂張、國內紛爭未息，新任政府內閣又無力領導全域的現狀，蔣、蔡等非黃埔系的實力派將領紛紛通電擁蔣，請蔣介石儘快恢復軍權，率部抗戰。毫無實戰經驗的孫科內閣，面對外患內憂、金融難題，頓顯焦頭爛額，亂象紛呈，只得趕快提出辭職。而蔣介石復職之時，順勢聯合了汪精衛，並推薦汪精衛繼任行政院長之職。

一月二十九日，蔣介石被國民黨中央任命為軍事委員，旋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就是「蔣委員長」稱呼的由來。事實上，蔣介石身雖下野，依然時刻關注甚至掌控著國家大事，比如淞滬戰事、遷都洛陽等決策就是在他的實際主持下制定的。

蔣介石感到在滬的十九路軍兵力稍顯單薄，乃會商於何應欽，急調張治中由八十七師、八十八

1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第三一九頁。

師組成的第五軍赴滬，協同蔡廷鍇部作戰，同時又令蔣鼎文馳赴前線，根據戰事發展待機出擊。

當時，對淞滬抗戰作出如下軍事部署：

由陳銘樞出任京滬路方面抗日軍左翼總指揮；由蔣鼎文出任滬杭路方面抗日軍右翼總指揮，率領第二軍、第十四軍，由江西移駐滬杭，在川沙、吳江構築第一線陣地，在嘉善、嘉興、平湖、乍浦構築第二線陣地。

整個二月份，蔡、張之部在上海閘北、江灣、廟行、吳淞、寶山等地與日軍激戰，雙方互有傷亡。日軍見久攻不克，乃增派部隊，決定於三月一日發起全線攻擊。其時原先準備派往前線的蔣鼎文、上官雲相、胡宗南等部無法按時趕到一線戰場參戰，為免被日軍包圍殲滅，在閘北、江灣已苦戰一個多月的蔡、張兩部主動向昆山、福山一線退卻。見戰事稍緩，蔣介石以新任軍事委員長的名義，於三月七日給蔣鼎文發出電令：「你部不必開到吳江，暫集嘉興附近」¹。至三月三十日，蔣介石又發出電令，要蔣鼎文部集中兵力，其中「獨立炮兵第三團開往嘉興，並逕自向軍政部領取所需之通信器材」云云。²

自此後兩個多月，蔣鼎文部駐防嘉興，枕戈待旦，聽候命令。

鑒於當時的國力、軍力，國民黨政府在五月五日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中日戰事暫時中止。其後，國民黨政府以「紅軍大部竄擾閩南，漳州相繼失守，同安亦危，著該軍全部由海道輸送進剿」

1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2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之名義¹，將蔡廷鍇的十九路軍調至福建；由蔣鼎文第九師第五十四團（團長吳斌）接替淞滬防務，駐紮於上海龍華等一線。

同年五月，蔣鼎文率第九師移駐津浦線蚌埠、徐州一段，並兼任津浦路警備司令，設司令部於蚌埠。

蚌埠是蔣鼎文出任第一師師長首立大功之地。四年半以前，他出奇兵攻占張宗昌部設在這裡的指揮部，俘獲、殲滅大量張部官兵，扭轉臨淮關之戰的危局。為獎勵蔣鼎文部戰功，何應欽讓蔣舉薦一人，取代作戰不力的第二十二師師長涂思宗一職，蔣毅然保舉副師長胡宗南出任第二十二師師長，從而使胡的晉職比同輩快了一步，胡也得在更大的舞臺上展現其軍事才能。

想不到時隔數年後，這一幕又要在蚌埠重現。因蔣鼎文任第九師師長已近四年，以第二軍軍長兼領第九師師長也逾三年，蔣介石要蔣鼎文集中精力，專任第二軍軍長，至於第九師師長一職，准其保薦合適人選。

當時第九師的職官們都認為，這第九師師長一職非甘麗初莫屬，因為甘時任第二軍副軍長，且是黃埔一期生，一直跟隨蔣鼎文，自第九師成立後，甘相繼任旅長、副師長職，立下許多戰功，蔣、甘兩人配合默契，私交甚篤。

然蔣鼎文卻保薦此時已不在第二軍的李延年，由李來出任當時如日中天的第九師師長這一重要職位，這多少有點出乎時人的意料。

李延年也曾是第九師的一員得力幹將，為山東廣饒人，黃埔一期生，參加過東征北伐。

1 《蔡廷鍇自傳》，第二九九頁。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北伐軍受阻於臨淮關，戰情危急，時任團長的李延年和另一團長陳琪率部苦戰，固守不退，後在友軍的協助下終攻占臨淮關，李立功受獎。次年，在濟南發生「五三慘案」，為避免與日軍正面交戰，蔣介石令主力撤出濟南，同時令李延年和鄧殷藩兩個團留守，狙擊和牽制日軍，以掩護北伐主力繞道濟南北進。李、鄧率部與日軍激戰兩天，成功完成牽制任務，獲得蔣介石當眾讚賞。同月，李延年晉升為第二師副師長。

一九二八年七月，部隊整編，蔣鼎文將李延年延攬到第九師任職，與甘麗初、劉顯庭分任其所屬三個旅旅長。李亦不負蔣鼎文所望，在抗擊西北軍、擊潰唐生智和慘烈的中原大戰之中擔當重任。戰後，李調任國民政府警衛軍第二師副師長、第八十八師副師長等職。李延年個性鮮明，桀驁不羈，恃才傲物，一般的上司較難駕馭。然蔣鼎文認為，像第九師這樣的勁旅，軍事主管必須有特立獨行、敢作敢當的軍人性格。

對於用李不用甘，蔣鼎文有他的用人觀，他是這樣解釋的：

我們調到蚌埠整訓，第九師師長出缺，委員長要我保薦一個人當第九師師長，我保薦了李延年。其實照私人關係上講，我應當保甘麗初當師長，甘麗初是我的學生，與我的關係深厚，又是副軍長，我和他親如手足一般，但是李延年能打仗，有戰功，我不能以私害公，還是保舉了李延年。我自從軍以來，是採用唯才是用的辦法帶兵，我部下排長出缺，由誰來升任，人人都能猜出，因為功績是明顯的，升了以後沒有一個人說是不公平，全軍皆心服我治軍決不挾有私心和成見。李延年來蚌埠接任，我移交給他二十五萬元的軍費，那是五個月的軍餉和師裡的公

積金，我召集全師官長訓話說：「今天的革命軍人一定要服從蔣總司令，我保薦李師長而不保甘麗初，就是我不私心和服從總司令的證明，革命軍人不私心才能打勝仗。」我率領第九師時，時常輕裝簡從，夜間查營，偷聽到士兵私下談話說：「師長待我們真好，他比我們都苦呀！」所以我對第九師的弟兄們很放心，他們一直都很好、很能作戰，以後第九師一直是國軍中能戰的勁旅。¹

當然，蔣鼎文也非常看重李延年的民族氣節。在兩個多月前，淞滬抗戰之時，李延年會同八十八師的師旅長俞濟時、楊步飛、錢倫體及八十七師二百六十一旅旅長宋希濂，以個人名義通電全國，不惜犧牲，誓與友軍共同禦敵。這種血性剛烈之氣，凜然的民族大義，無疑為蔣鼎文保薦李延年加了分。

李延年於一九三二年七月正式出任第九師師長，未幾又兼任徐州警備司令。自此後，李長期為蔣鼎文的部下，繼而又經蔣鼎文保薦，任第二軍軍長。李延年亦不負蔣鼎文之重望，成為又一個胡宗南式的將領，是黃埔第一期學生的佼佼者之一。

五、總領水師，編練新軍

上海抗戰之事告一段落後，蔣介石對剿共未竣大業還是念念不忘。他認為對日的妥協是為了對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一頁。

內的安靖，眼下對他威脅最大的是與他主義不同的工農紅軍。

把蔣鼎文部調至津浦線，蔣介石是有戰略安排的，如日軍向北威脅，則蔣部在鐵路線上可鞏衛首都南京；如日軍暫無動向，則其所部可作為圍剿鄂豫皖紅四方面軍的一個部分。

在津浦線上，蔣鼎文對部隊作了一次整訓，除調任李延年回歸第九師出任師長以外，蔣又把第二十六旅旅長陳沛升任為副師長。陳作戰勇敢果斷，屢獲戰功，頗受蔣鼎文賞識，而李與陳曾在二十六旅先後任旅長，陳又在李手下任過團長，兩人頗為默契。

蔣部在津浦線駐紮期間，適逢中共地下武裝組織的一次農民大暴動。原來，國民黨王均所率第三軍在當地巧立名目，對抽食煙草者橫徵暴斂，激起宿州、靈縣民憤，中共地下黨趁勢發動暴動，一時達數萬人規模，蔣鼎文奉命率部鎮壓。與此同時，他配合蔣介石對鄂豫皖紅軍圍剿，又在戰事搜索中繳獲了不少中共地下武裝人員名單，遞交給國民黨中央並按蔣介石之命，一一抓捕。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交，國民黨對鄂豫皖紅軍的圍剿取得進展，在強敵逼迫之下，紅四方面軍已無法在鄂豫皖蘇區立足，乃被迫轉入陝南和川北地區。

其時，蔣鼎文奉調率李延年第九師等部西赴武漢。至十二月，第九師趕赴宜昌、當陽一帶駐防，配合其他部隊圍剿紅軍。也就在這時，蔣以第二軍軍長身分兼任長江七省（川、湘、鄂、贛、皖、蘇、浙）水警總局局長，其職責是防止共軍竄擾，同時兼辦防匪緝私。蔣介石又於次年一月命蔣鼎文赴杭檢閱空軍，另巡視鎮海炮臺，¹成為「海陸空」三軍巡守要員，權力之大，一時無二。

1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旋之，蔣鼎文又兼任武漢編練處長，以鄭武為副處長。蔣將一些地方武裝和保安團經整訓後，編練成四個團的兵力，分由祝夏年、李樹棠、連英豪、李德生出任團長。

蔣鼎文感到兼職太多，事煩，乃推薦樓景樾接任「七省」水警總局局長兼編練處主任一職，蒙蔣介石獲准。樓景樾不僅與蔣鼎文淵源頗深，還是黃埔一期學生中起點最高的一人，有必要在這裡作一交代。

樓景樾，又作樓景越（月），原名樓光，別號秀挺，一八九九年出生，浙江諸暨牌頭鎮上樓家人。祖輩務農，家有田地，屬小康之家。樓因長得高大肥胖，人呼樓大胖子。樓景樾政治嗅覺敏銳，精明幹練，富有號召力，還在諸暨中學讀書時，就響應宿儒，也是蔣鼎文老師吳忠懷



一九三三年蔣鼎文於漢口與夫人及幼女佩衡合影

的號召，會同其他人在諸暨成立浙東討袁（世凱）軍。諸暨瑣山人傅國英為前敵總司令，傅國俊擔任農民軍指揮官，斯爽擔任由退伍官兵組成的模範營指揮官，而樓景樾小小年紀即出任由三百多名學生組成的學生兵指揮官，少年才俊，膽魄氣度，令人刮目。就這樣，諸暨這一武裝倒袁活動與蔣鼎文在杭組織的「倒朱（瑞）討袁（世凱）」運動互相呼應，氣勢磅礴。

在這場討袁運動中，蔣、樓兩人相熟相知。當諸暨討袁之役被浙江巡按使屈映光鎮壓後，樓景樾便遠走他鄉，報考北京高等警官學校。畢業後任職於福建泉州警察局，繼任福建陸軍第五旅第二營副官、團部軍需、中央軍需交通局委員等職，並由陳英士介紹加入國民黨，又經吳泉明等推薦，投考黃埔軍校第一期，為黃埔一期學生中學歷最高者之一。

黃埔半年就學，樓景樾頗受蔣介石賞識。在組建黃埔軍校教導團時，按照當時的規矩，團長由總教官何應欽擔任，營長由優秀軍事教官擔任，副營長、連長由優秀學生隊長擔任，第一期畢業的學生多為排長或班長，如陳明仁、胡宗南、李延年等為排長，宋希濂、杜聿明等為副排長，鄭洞國為連助理黨代表，蔣先雲為連黨代表等等，而蔣介石把樓景樾直接提升為第二團團部直屬的特務連連長。要知道其時的蔣鼎文還是第一營副營長兼二連連長，陳誠更是一個機槍連連長，一個剛畢業的學生就與他的師輩在職務上幾乎平起平坐，這實是破格的提拔。現所能見到的黃埔軍校創始組織表，樓景樾就榜上有名，這在黃埔第一期畢業生中絕無僅有，可見蔣介石對其之器重。在北伐戰爭中，樓景樾與蔣鼎文同在第二師任職，樓的職務遞升至營長、團長。龍潭一役，樓率部血戰竟夜，以尿解渴，終於獲勝。戰後，樓獲北伐軍總部褒獎，傳為全軍楷模。

一九二八年七月，國民黨中央軍縮編為十三個師，樓景樾、黃傑初出任第二師（師長顧祝同）

團長，未幾，蔣介石藉故免去老資格的黃國梁、涂思宗旅長之職，另行他調，分任樓、黃為第四、第五旅旅長，隨顧祝同參加中原大戰。戰後，樓任第二師副師長、代師長、師長之職，又率部參加圍剿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是剿共的主力部隊，與黃埔一期同學徐向前所部作殊死血戰。

樓患有肝疾，其時日趨嚴重，已然難以再任主力師師長的職務，報蔣介石批准到上海延請中醫診治，達幾個月時間，二師師長一職乃由湯恩伯繼任。樓任職期間，由於不大重視時任該師第十團團長鄭洞國的意見，兩人之間合作不太愉快。多年以後，鄭洞國也曾撰文對樓發洩不滿。

由於當時主官的病情屬保密範圍，即或當時在樓手下任職的營連級軍官也不知情，如黃埔第四期畢業生、時任第二師代營長、後任臺灣陸軍副總司令、一級上將劉玉章就不瞭解，他的《戎馬五十年》對此回憶就有差池。他說，我第二師「擔任豫鄂皖邊區剿匪工作，移師信陽、潢州一帶，師長樓景樾未採主動，消極地與匪對峙者達四五月之久，同時師長久羈上海不返，……結果樓師長撤職，而由湯恩伯將軍接替。」對這種不明原因的記述，知情者臺灣學者周正大撰文予以澄清，他說：「事實上劉玉章此段記載與事實頗有出入，第一，所謂師長樓景樾久羈上海不返一節，實因樓氏時正患肝疾甚重，滯留上海延請中醫安樂醫生診治達數月之久，當屬呈准病假，並非長期請假逍遙上海。第二，撤職並非真情，事實上乃派湯恩伯補充，並另委樓氏出任侍從室侍衛長。民國二十二年蔣長官銘公時任第二軍軍長兼長江上游七省水警總局長，為栽植接班人，遂將水警總局長職讓與樓氏，惜樓氏於接任後舊病復發，竟至不起，不然可說其前途未可限量也。」¹

樓景樾由於肝病久治未癒，一度到普陀山拜佛念經、休養身心，然樓棄戎出家的傳聞，實是穿

繫附會也。

周正大的文章除將警衛軍第一師（後改為八十七師）師長之職誤會於侍衛長（可能係警衛師長之故）外，其他都符合史實。因為樓景樾肝病穩定後，蔣介石即任命其為第八十七師師長，俞濟時為副師長，其後接替樓景樾師長一職的是大名鼎鼎的張治中，可見當時這個位置在蔣介石心目中的重要。

蔣鼎文所兼的長江七省水警總局局長一職，為軍一級職務，蔣鼎文向蔣介石保薦由樓景樾繼任其職。然樓到任時間不長，所患肝疾復發，終告不治，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在任上病逝。蔣介石親書「精神不死」輓聯弔唁。

黃埔軍校研究專家陳宇在《中國黃埔軍校》第三二一頁記述道：蔣介石復出後未久，「先後晉升胡宗南為第一軍第二十二師師長，樓景樾任代理第二師師長（樓是浙江諸暨人，一九三一年任警衛第一師師長，副師長是俞濟時，樓如果不是身弱多病，前途不可限量），李延年任第二師副師長」等職。他所研究比較的都是黃埔第一期畢業學生其時的任職，樓的升職之速確與胡宗南並列無二（李之龍特例除外）。

對於樓景樾之死，蔣鼎文不勝唏噓，因為剛在幾天前，他已失去了另一位同鄉好友，也是他中原作戰的老同事，保定第三期畢業生陳時驥將軍。陳時任第五十九師師長，與第五十二師師長李明一起在陳誠的指揮下，與紅一、三、五軍團激戰於江西宜黃。兩個師先後被紅軍擊潰殲滅，李明重傷被俘後不治而死，陳時驥失蹤，或死或俘，均有可能。

順帶在這裡提及陳時驥的被俘和去世情況，時任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曾回憶：

最後清查俘虜時，沒有發現敵人的第五十九師師長。我們知道，五十九師師長叫陳時驥，是個麻子。於是發動部隊繼續搜查。後來，軍團部電臺班上山砍樹回來架無線的同志告訴我，我們抓到了一個俘虜，是個當官的。我問臉上有沒有麻子，說是有，就這樣把他從俘虜中清查出來了。

據說陳時驥被俘後，紅軍領導念其有深厚的軍事素養，勸他在紅軍大學擔任軍事教官。然在中央紅軍離開蘇區突圍前夕，左傾中央領導人決定以非常手段處置一批反革命分子和異己分子，陳時驥連同寧都起義的領導人季振同、黃中嶽等人集中關押在瑞金九堡山區監獄，被秘密處決。

戰時的軍人，對人員死傷見多不怪，但心理感情還是非常脆弱，特別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失去了相熟相知多年的同鄉摯友，且同是國軍的高級將領，蔣鼎文悵然不已。

蔣鼎文在武漢卸任兼職不久，就接到蔣介石命令，令其部隊就近西下，到江西集結。原來，蔣介石又要對江西中央蘇區紅軍進行清剿了。